

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的由来

——评《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 郑渝川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教授玛丽·伊万丝长期以来专注于探索性别和阶层结构在现代社会历程中的角色。《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即为伊万丝所著，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着眼于当代社会诸多代表性的社会观念，包括科学思维、理性精神、平等观念、功利性、多样性、现代人的孤独等，如何形成并强化，以及由此如何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世界。

《现代社会的形成》选择公元1500年作为现代社会的开端，是从社会存在和观念发展的角度而定的。哥伦布在这一年抵达西印度群岛，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的诸多科学与艺术成果，也是在这之后才得以进一步释放与裂变绽放。更重要的是，十六世纪以前的欧洲是宗教统治严密、政治极度分散化的社会，印刷术促成了政教合一体系的瓦解，也带来了宗教改革。

伊万丝在书中讨论了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等人有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观点，两者观点差异很大，但共识在于，均肯定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十六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和因殖民运动富裕、强大起来的新兴阶层，对于欧洲国家王室的统治，产生了威胁。这样的紧张关系持续到十七世纪，促成了捍卫君权神授说的詹姆斯一世，与代表贵族和新兴阶层的议会的决裂。尽管这种决裂，以及之后更加激昂的光荣革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全民民主，但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肇始于十六世纪的政治斗争，非但瓦解了教权，造成了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这样的世俗化进程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缓慢地画上句号；而且将王权拉入到不再神圣的低谷，这是十八世纪晚期发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上半叶爆发宪章运动及1848年革命的重要基础。

因为宗教改革、教权不振，欧洲重新陷入分裂，但这样的分裂本质上是进步性的。各国王室、贵族、新兴阶层、广大市民，越来越多的人燃起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强烈兴趣。此后顺理成章地迎来了十七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

启蒙运动的内核是理性和科学，最重要的开创人物是笛卡尔。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获得了相比之前优良得多的条件，但“又存在各种同样强大的抵制形式”。我们今天所说



《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英]玛丽·伊万丝著
向俊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的科学精神，在当时从极少数人所实践的风范扩大到之后决定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核心理念，经过了长期争斗和冲突。书中指出，迟至十七世纪，欧洲大陆各地仍然充斥着对于异端的狂暴情绪和行为。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长期发酵、科学和新生的工业技术广泛发展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形成世界可被认知、可被控制的观念。

书中讨论了女性意识在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背景下萌发及走向勃兴的过程。十八世纪之前，欧洲社会和文化仍将女性视为男性

的附属品，人们对“人类”、“人”的理解耗费了几个世纪，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才初步建立性别差异的意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出现专门针对女性的商品、社会指南和政治运动。到1800年，之前肆虐欧洲大陆几个世纪的捕捉并烧死女巫的事件真正绝迹，标志着“这片大陆也认识到了人类平等的可能性”。

拿破仑统一欧洲的想法和行动，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打击下走向失败。有趣的是，拿破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传递给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原先依附于大国的附庸国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当然，我们要看到，拿破仑战争之前的几个世纪中，鼓吹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学家的著作也被越来越多地传递到欧洲各角落，随着识字率的提升，这样的新型价值观念当仁不让地驱散了原先人们对于政治和社会等级的盲目畏惧。

作者也指出，十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尽管在工业革命强劲动力的驱动下获得大幅发展，但整个大陆和英伦三岛无论是城市、社会形态，还是经济组织形式，仍显得混乱无序。十九世纪发生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以及更为完善的国家管理架构，开始终结这样的混乱。教

育、医疗开始被承认需要由国家供给的公共物品，而女性也被接纳加入科学研究领域，摆在女性之前的科学和知识性别预设之障碍，终于有了了解体的迹象。当然，在生产得以空前发展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野蛮扩张滋生的社会后果显露无疑，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兴起。

《现代社会的形成》还详细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获得巨大发展后，在思想、文化、社会、艺术等多个领域掀起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潮流。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那些原本对于现代性有着最为真诚的夸奖的思想家，也感到震惊和羞愧。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事实上已退出世界霸权的可能性争夺，针对现代、发展、霸权的人文反思蔚然成风。以福柯为代表的学者对于传统历史认知和叙事都提出了挑战，这意味着学界不再秉持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或者说欧美世界不断进步的正统观点，工业化、技术革新、世俗化等近代以来的观念价值也陷入反思质疑的漩涡。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议题、思想议题，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一轮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以来的价值理念就没有意义。

十九世纪的中法美译

——评《中法西译：〈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

■ 王栋

李秀清教授的专著《中法西译：〈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最早是在微信上看到的。初见中英文题目，已觉颇有趣。再见其作者、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皆是学界翘楚，更为意动。至读罢代跋“缠足与束腰”，作者之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和个人旨趣已萃萃可见。

中文书名“中法西译”用词典雅，英文书名“Perception and Reception”则颇有西人题目之意味。某种程度上，该书的跋最为精彩。近代以来的中西法律比较，是在中西文明相遇的背景中展开的，重新理解这种比较具有鲜明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中国学者之理论解释鲜有突破。作者开篇提出的问题显现出其对学界范式变迁的谙熟与反思，即中国学者在“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全球史观”和“新史学”之间的游移踟躅。作者以缠足与束腰作比，敏锐地注意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的问题，并形象化地展现出来。其间的理解、想象和描述，不仅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更体现出一个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

该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近年来的论文，后一部分是一些值得发掘的英文史料的翻译。从主题看，论文整体较统一，关注十九世纪中西法律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和新问题。以史料论，大略分为两部分。第一章讨论“特拉诺瓦案”，将其

放在中西文明交往的语境中重新理解，发掘其在治外法权中的作用。后四章以《中国丛报》为主要史料，论及《中国丛报》之研究价值及其所载的政制、刑法和诉讼法相关内容。

毋庸讳言，中国的法制史研究者素来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即如何吸收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作出不同但不逊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法西译》展示了这一跨学科交流的可能性。“特拉诺瓦案”研究早已卷帙浩繁，作者吸收国内外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将其置于中西交流的语境中展开，细致梳理了中西方对案件事实、证据采集和审理形式的不同理解，作者的评价十分审慎，没有试图给出一种“特殊”的法律史意义。

如果说“特拉诺瓦案”的研究还是一种比较审慎的借鉴，围绕《中国丛报》的系列研究则显现鲜明的自觉。史学界大多推崇“史学就是史料学”，对史料的占有往往是学术讨论的前提和基础。相较于史学界对《中国丛报》的高水平研究，作者试图将其纳入法学研究的视野。第二章《〈中国丛报〉与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研究》讲述了《中国丛报》的沿革、内容、使用和价值，以“引起法史同仁对它的关注”。第三章《神治文眼中的清朝帝制》，以神治文观察中西的文章作比，凸显了十九世纪中西方的巨大差异，初步意识到这种描述本身对中西方文明发

展的影响。第四章《〈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中的中国刑法观》，讨论了《中国丛报》所载的犯罪、刑罚、刑讯和涉及《大清律例》的相关记载，注意到语言、意识形态和不同理解影响了以上局面的形成。第五章《〈中国丛报〉中的清代诉讼及其引起的思考》，辨析了《中国丛报》记录的诉讼中的不正义，理解其中蕴藏的偏好、抉择和塑造，并与《论美国的民主》相比较，认为观察视角影响了两者的观察。

总体上，该书不乏亮点。作者对史料的细致梳理颇见心血和功力，如对《东西洋考》创刊日期的确立。部分史料的发掘也很有意义，对清末死刑相关记载的梳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对死刑的理解和运作。许多判断体现出作者敏锐的学术嗅觉，如注意到死刑相关记载与清末刑法改革可能的关联性，对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叙述及其扩大作用，观察视角对叙述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些评论大多浅尝辄止。同时，在具体行文中，作者并未如其腹中那样具有批判性。如在第四章，作者注意到了西方刑罚的残酷性，并注意到福柯的相关论述，但对西方刑罚的评论浅尝辄止，而《规训与惩罚》开篇的残酷场景恐怕难以忘怀。即使这一时期西方已进入新的刑罚技术，但酷刑中的“理性计量”似也可成为文章的一部分。总体上，相较于审



《中法西译：〈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
李秀清编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慎地符合主流的评价，笔者期待作者更具个人特点和突破性的评论。

另外，第二部分有两个附录，分别是“‘小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述评”和“美国报纸报道‘蒲安臣使团’、‘李鸿章使团’有关选译”（附导读）。两者都颇有价值，尤其是前者，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十九世纪西方上半叶的中国法解释。美中不足的是，书中有翻译错误，作者把约翰·弥尔顿《致克伦威尔将军》中的诗句“Peace hath her victories, No less renowned than War”翻译为“和平也是一种胜利，虽不及战争显赫”。“no less than”在英语中是“不低于”的意思，译为“显赫毫不逊战争”似乎更妥。将复数之“victories”译为“一种胜利”似也过于草率，按汉语习惯不译出亦无可，如“和平亦是胜利”。前辈学者的译文可为参照，尹宝书先生将此句译为“平时和战时同样，能创造不朽的事业”。朱维之先生译为“和平阵线的凯旋，跟威震战场一样”。作者译文晓畅，似不该犯此低级错误。笔者翻检网络，发现译者采用之译文系某游戏中的译文，流传甚广，故此指出。